

我的父亲母亲 ·王汝焯·

父母王岷源、张祥保是在北大认识的。母亲的父母早亡，她从小就在叔祖(祖父的弟弟)张元济上海的家里长大，先后就读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和圣约翰大学。大学时她原来想学物理，但因在战争期间，没有实验室，她只得转学经济。毕业后曾短期在中西女中教过书，之后来到北京，先在燕京大学短暂任职后再到北京外国语系当“讲员”。她来北京时叔祖曾拜托他的老友、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照应。母亲说她去过几次胡家，见过胡太太和她的客人们一起打牌。

父亲在四川老家读过私塾，也读过大学预科。他1930年考入清华外文系，1934年毕业后又进入清华研究院。因为父亲从没有受过系统的数学教育，他考清华时的数学分数很低，母亲经常笑话他数学零分进清华。后来才知道其实这并不稀奇，当时好几个人都是数学零分或低分进清华，比如父亲的同学钱锺书和季羨林。父亲于1936年考取庚款留美，但因为次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延迟到1938年才赴美。他在耶鲁大学读语文学，获得硕士学位后还跟从赵元任教授在耶鲁和哈佛工作过几年。1946年得到北大校长胡适的聘用，成为北大外语系副教授。

父亲是重庆人，母亲是上海人，“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在北大时他们住在各自的单身宿舍，母亲住在民主广场北侧的灰楼，父亲住在民主

广场南侧的红楼，两人隔着民主广场遥遥相对。他们在1947年学校的一次茶话会上初次结识。这个茶话会由他们的同事严倚云召集，她是翻译《天演论》的严复的长孙女，后来留学美国并任教。父母相识后，胡适校长曾给母亲的叔祖写信通报消息，介绍父亲的情况：

菊生先生：

十一月廿一日大礼收到了，谢谢先生的挂念。今夏报告关于祥保女士的消息，渐得证实，我也很感觉高兴。

王岷源先生是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的副教授，现兼任训练印度政府派来北大的十一个学生的华语学习事。近年我在哈佛大学往来，见他寄住在赵元任先生的家中，见他温文勤苦，故去年邀他来北大任教。他的学历如下：

1930年，十九岁，考进清华，1934年毕业；1934-1935年，在清华研究院。1935年曾回四川，在中学教过书，不满一年。1936年，考取清华官费留学，依当时规定，留校受训练一年，因战事发生，延至1938年始赴美国，入Yale大学，1942年得MA学位。1942-1946年，他在Harvard大学及Yale大学担任助理教学的工作，侧重用新方法教授中国语言，在Yale教授Dr. George Kennedy指导之下，甚有成绩。

王君人甚清秀，中英文都很好，写汉字甚秀雅，情性忠厚温文。我在美国观察此君，很喜欢

他的为人敦厚。

以上所记，或足供先生的参考。将来如有适可以效劳之处，决不敢辞。

适大约十二月十一日南飞，在京赴中基会毕，当仍来沪小住，那时必来看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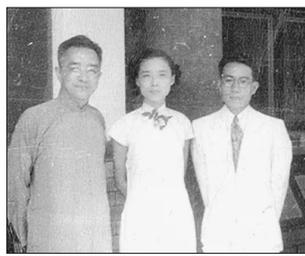
敬祝

先生起居胜常

胡适敬上 卅六，十一，卅夜

父母于1948年8月10日结婚，婚礼在王府井的欧美同学会举行。男女证婚人分别是北大校长胡适和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的遗孀毛彦文。熊希龄也与张元济相识，因为他们同年考中进士，互称“同年”。母亲因此称毛彦文为“太年伯母”。当时毛彦文在香山经营丈夫遗留下来的香山慈幼院，并得到联合国救济总署(UNRRA)的资助，母亲曾帮她处理与UNRRA的往来信件及账目。父母在城里欧美同学会的婚礼后就来到郊外毛彦文所在的香山度蜜月，住在熊希龄于1918年所建的私宅双清别墅。

结婚对母亲来说就是穿过民主广场，从她的灰楼搬到父亲的红楼。那里一二层是教室，三四层是单身教师宿舍，楼里没有厨房。他们就在沙滩大街上的一个叫作“小小食堂”的餐馆吃中饭，并和几个同事在另一家四川夫妻开的饭馆包晚饭。不久，母亲怀上了我。一次在协和医院做产前检查时，



王岷源、张祥保结婚照，左为证婚人胡适

林巧稚大夫告诉她，“你们北大的胡校长走了”。胡适离开时给他在北大的同事汤用彤、郑天挺留下的最后的话：“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只好拜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胡适走后，位于东厂胡同里宽敞的校长府邸空了出来。因为时局动乱，汤用彤先生让胡思杜请人来暂住，也可以帮助照看一下那里的房舍。胡思杜就找到我的父母和其他一家人搬进胡适的府邸。但住在这里总不是长久之计，而且不久后我就要出生，红楼的单身宿舍容不下三口之家，母亲于是开始找房子。系主任朱光潜先生的太太告诉母亲，他们住的中老胡同32号内有人刚巧搬走，让我父母去申请那里空出来的房子。此后不久，他们就搬进了中老胡同32号内的一间东耳房。这里有客厅兼书房，饭厅，睡房，后面有厨房、厕所和一间小屋子。和红楼的单身宿舍相比，这里方便多了。7月23日，由林巧稚大夫接生，我在协和医院出生。几天后我随母

亲回到中老胡同32号，成为那里最小的居民。

中老胡同32号是一个很大的院子，曾经是清末光绪帝珍妃、瑾妃娘家的住宅，据说二位妃子可以在景山上眺望就在东边不远处的中老胡同。这里离位于沙滩的北大很近。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北大迁回北平，中老胡同成为北大教师宿舍，住进30多户教授家庭。我家住5号，父母所在的外语系主任朱光潜住在6号。沈从文住19号。我从此就一直生活在教授们的圈子里了。听母亲说，那时父亲常抱着我到街上去看汽车。

那时父母在这些教授中是小字辈。母亲初为人母，曾得到好几位邻居的帮助，其中有孙承谔、朱光潜、江泽涵、贺麟、陈占元等多位教授的太太。她们时常关心询问我的情况，还教母亲怎么给我洗澡，怎么照顾我的过敏发痒。那时胡适的儿子胡思杜也住在32号的一间小房子里，他送给父母一瓶酒祝贺我的出生。

1948年底胡适离开北京之后，留下的藏书被北大图书馆收走，家具则由胡思杜陆续送给了熟人朋友，其中两个有玻璃门的书柜就送给了我的父母。50多年后，北大成立校史馆并开始征集前校长胡适的旧物，母亲就把这两个书柜捐赠给校史馆。这两件我父母用了一辈子的家具，成了陈列在校史馆内纪念前校长的文物。

(摘自4月17日《文汇报》)

恩师张守仁 ·宗颖·

1996年，与号称“京城四大名编”之一的张守仁因编书结缘，继而成为师徒、同道者和忘年交。张守仁从事文学编辑工作40余年，他编发的《高山下的花环》《张铁匠的罗曼史》《公开的情书》等作品，在全国获奖并得到广大读者喜爱。与张老师的两次合作，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亮点，他是我的恩师和贵人。

第一次合作是1996年春，在日本留学六年的友人方军回到北京，交给我一堆夹在活页本中的凌乱文稿。1995年，在《中国青年报》上，我看到他发表了一篇采访侵华日军老兵的文章《我所认识的鬼子兵》，立刻给他去信约稿，希望他多采访一些侵华老兵，深挖素材，多拍照片，将这篇文章扩充成书。

于是方军继续采访了30多个日本老兵。因为采访和写作环境恶劣，有时是借送外卖之机，与原日本侵华老兵聊上几句，记录在纸条上，有时是趴在医院仓库的纸盒子上写几笔，半夜回到驻地后累得筋疲力尽，没有精力整理当时的笔记，所以原始初稿散乱，是碎片段落式的，语句也比较粗糙，整体结构尚不成熟。

这时候我想到张老师。在



1991年张守仁(右)与汪曾祺

北京出版社大楼后职工小区的一幢塔楼，我敲开了张老师的家门。初次见面，张老师儒雅谦和，有一种自然的贴切感。他请我在狭小门厅里的饭桌旁坐下，立刻埋头翻看起稿子。

“我很想见见这位作者！”大约十来分钟后，张老师抬起头兴奋地对我说。第二天，我陪同方军再次来到张老师家里。张老师紧紧握住方军的手，又热烈地拍拍他肩膀说：“你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详细询问过方军在日本和回国后的一些情况后，我们三人在门厅里围桌而坐，张老师抄起“剪刀”开始干活。他指着那行书名说，请允许我把这个“所”字去掉，一边用笔在所字上划了一道。书名更简洁了，读来上口易于流传。好！方军和我交口称赞。

张老师冒着酷暑，用两周时间编完稿子。从结构、章节

顺序的调整，到修改润饰文字和标点符号、撰写图片说明等等，每一页稿纸上都改得密密麻麻，文稿紧凑流畅。

199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同胞遇难60周年纪念日，这本书的首发座谈会召开。该书出版后方军一夜成名。30多年后，方军写道：“张守仁编辑给《我认识的鬼子兵》把关、润色、提携、指导，离开张先生我的书就是一盘松散的豆腐渣，他把这盘豆腐渣捏成一盘具有色、香、味、型的美食。”

与张老师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另一位中国留日学生李仲生的传奇，书名叫《没有播出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末，电视系列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在全国热播，李仲生是“我的太阳”一集的男主人公。他东渡扶桑苦读14年，50岁才考取经济学博士。纪录片播出后感动千万观众，也曾引起争论。受文字表达能力所限，他同意我的建议，自传由他口述请人代笔。于是，我又去张老师那里搬救兵。

年近70的张老师多次骑着自行车，从自己北三环的家到东四环李仲生家里核对细节，几易其稿。同情弱者，默默帮助一些低层的写作者，作为编辑，他做了许多这样的事。

(摘自5月27日《北京青年报》)

(上接第1版)

为国际流失文物追索 归还贡献中国智慧

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表示，美国史密森尼学会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向中方返还帛书《五行令》《攻守占》，彰显了其在文化遗产保护合作中恪守博物馆伦理的努力，是中国主导制定的《青岛建议书》以对话与合作推动历史上流失文物保护与返还理念的成功实践。

确实，在子弹库帛书追索返还工作过程中，中方始终秉持《青岛建议书》的基本原则与理念，将文物返还与以回归文物为纽带推动中美相关博物馆长期合作相结合，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进行多轮磋商谈判。

这里提到的《青岛建议书》于2024年由中联合18个文物原属国联合发布，全称为《关于保护和返还殖民背景下流失或通过其他非正义、非道德方式获取之文物的青岛建议书》。该建议书提出解决历史上流失文物追索返还这一国际性难题的原创性中国方案，并成为文物原属国对西方博物馆关于历史上流失文物返还新政策的首次集体公开回应，为国际流

失文物追索返还贡献了中国智慧。

近年来，中国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有59批次2180件/套流失海外中国文物回归祖国。在2024年，中国政府积极推动返还实践，共实现8批次213件/套流失海外中国文物艺术品回归祖国，涉及意大利、美国、日本、阿根廷等国家和地区。

值得关注的是，溯源及流转历史研究，是评估文物来源及获得情况的基础。从流失文物追索返还角度而言，溯源及流转历史研究是对文物所有权(变更)及其物理流转全部情况，包括各阶段持有者处分权及交易与进出口所获许可等情况的查明。

国家文物局负责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的相关部门负责人指出，历史上流失文物追索工作的实践表明，溯源及流转历史研究是中国开展追索工作的必要基础和对外磋商谈判的重要依据，期待更多文化与文物、法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加入溯源和流转历史研究中。国家文物局也将继续推动子弹库帛书《四时令》早日回归。(摘自5月2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